

第二轮修志自然部类记述困境 与浙江创新实践特色

——兼对浙江省市县二轮修志指导实践的理论思考

周祝伟

提 要：社会主义时期全国首轮修志自然部类在篇目设计与内容记述方面，由于立足并紧紧围绕服务于改革开放初期百业待举的经济建设需要而取得了成功。这一传统的成功模式，在浙江第二轮修志早期实践中相当程度上被较为普遍地沿用。随着绿色生态理念倡导引领、经济转型发展、人民生活需求迭代升级，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逐渐由单向度的攫取型关系向双向度互融式的友好型关系转变。在第二轮修志实践中，浙江各地直面自然部类记述三大现实困境与传统痼疾，精心调整选材视角和记述重心，以创新实践有效提升记述内容的应有价值。

关键词：浙江 第二轮修志 自然部类 记述困境 创新特色

在以续志为主要形式开展的第二轮志书编纂实践中，最受困扰的问题当首推自然部类的记述问题。在浙江第二轮修志早期实践中，自然部类记述主要面临三大困局：一是该部类传统记述对象的长时段属性与续修志书记述时限短期化之间的矛盾。自然部类的记述对象，按照首轮志书篇目框架和编写传统，一般涉及地质、地貌、土壤、植被、山脉、水系、气候、水文、矿藏、动植物资源等，其中的大多数要素均属于长时段性质。而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第十条规定，“地方志书每20年左右编修一次”。这就使得记述对象自身的长时段属性，遇到了续修志书编纂实践的短时段记述任务，两者之间形成了一对不易调和的矛盾。二是该部类内容记述泛化和碎化并存倾向与读者阅读体验感之间的错配矛盾。由于记述时分类方式选择上忽视了大多数非专业研究型普通读者的需求，自然部类记述内容往往偏好于对自然要素进行类型化详细分析和对具体自然要素进行个体化细致描述，轻视甚至忽视各个自然要素联聚情形（如自然景观）及其变迁变化的整体描述、呈现和记录，极大影响了非专业研究型读者的阅读体验和兴趣。三是该部类在传统框架下记述内容与新时代社会需求之间的调适难题。随着绿色生态理念倡导引领、经济转型发展、人民生活需求，迭代升级，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逐渐由单向度的攫取型关系向双向度互融式的友好型关系转变，如何根据新时代社会需求，与时俱进落实修志为用成为新的课题。针对第二轮修志自然部类记述三大困局困境，浙江各地在省地方志办公室指导下发挥主观能动性，立足本地实际预流新思想新发展新变化，秉持资政、为民、存史三大理念，积极探索创新，力求破题破局，在第二轮修志实践中探索走出了一条富有特色的创新之路。

一 秉持修志为用之初心，因时应需选准角度、创新内容， 实现错位有效记述

方志之始，实为应需而生。周公制礼，设官分职，地官司徒有土训、诵训二职。土训“掌

道地图以诏地事；掌道地愿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诏地求。王巡守，则夹王车”；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掌道方愿以诏辟忌，以知地俗。王巡守，则夹王车”。东汉郑玄作注曰：“道，说也。”“掌道地图以诏地事”，即“说地图九州形势、山川所宜告王以施其事也”；“掌道方志以诏观事”，即“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以告王，观博古所识，若鲁有大庭氏之库、穀之二陵”^①。土训、诵训各自所执掌的职责，大致分属于今天地方志书中的自然与人文两大类内容。正因为其所执掌职责的重要性、专业性和实用性，土训、诵训在肇始之时，即被赋予了“王巡守，则夹王车”的崇荣，必须随行以备顾问。而在唐代名相李吉甫眼里，地方志书中最切实用的则是自然部类的内容。他在《元和郡县图志》序中说：“（臣）以为成当今之务，树将来之势，则莫若版图地理之为切也。……至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不书，将何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此微臣之所以精研，圣后之所宜周览也。”^②北宋乐史在《太平寰宇记》序中也说：“万里河山，四方险阻，攻守利害，沿袭根源，伸纸未穷，森然在目。不下堂而知五土，不出户而观万邦。图籍机权，莫先于此。”^③

任何一个特定社会的需求不仅是多元的，而且也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的。在古代传统农业社会，统治者为满足口腹耳目之欲施行土贡制度，需要了解掌握各地土产特产、奇珍异玩；为了争战征伐，需要了解各地人口多寡、山川形势、关塞险隘。而普通百姓，为了生存，需要了解蛇虺魍魎、蛊毒瘴疠；为了发展生产，需要了解宜稻宜麻宜桑之土地；为了行旅交往，需要了解各地言语习俗之所恶。近代洋务运动兴起，西方工业文明之风吹进中国，中国整个社会的需求随之改变。人们对自然环境关注的重点，逐渐转向近代工业社会所需的铁、煤等矿物资源的有无、多寡等。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上下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和发展战略方针，掀起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潮。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各地编修的社会主义时期首轮志书中，地层、构造、矿产资源等都成了不可或缺的标配内容。这也是地方志在当时百废待兴、大规模开展基本建设的社会背景下，为适应社会迫切需要而进行的内容创新。

随着以计算机、微电子和通信技术为主要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的到来，人类社会开启了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迈进的新进程。人们在工业文明时代固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甚至被颠覆，对于自然界有了全新的认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开始由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对物质和能源的索取与被索取、挤压与被挤压的紧张关系，逐渐转向重视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友好互动型关系的构建。浙江省率先践行绿色生态发展理念，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一大批绿色生态产业迅速兴起，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深刻变化，工业化时代向绿水青山要金山银山的单向掠夺式开发模式，逐渐迈进到后工业化时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模式。

社会需求的多元与多变，不仅为地方志书自然部类与时俱进应需错位记述提供了切实的可能，而且为地方志书发挥更大效用和价值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应用场景与空间。在浙江省第二轮修志实践中，绝大部分根据本地实际积极探索，牢牢把握“因时”“应用”“错位”三大关键词，在破解编纂困局和满足社会应用方面取得了颇有成效的创新成果。

在记述自然资源时，《温州市志（1991—2012）》（商务印书馆，2020年）从植物资源的

① 参见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16，崇禎元年（1628）毛氏汲古阁刻本，第5册，第13—15页。

②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序”，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第2页。

③ 乐史：《太平寰宇记》，“序”，中华书局，2007年点校本，第1页。

利用角度出发,在动植物资源章下所设植物一节中,分设食用植物资源、油料植物资源、饮料植物资源、饲用植物资源、药用植物资源、农药植物资源、有毒植物、工业原料植物资源、用材植物资源、观赏植物资源、绿化(防护)植物资源、珍稀物种12个目进行介绍。通过分类方式的调整,既实现了与前志的错位记述,解决了两轮志书内容的简单重复,更呼应了社会新需求,提升了记述内容的实用性。《金华市志》(方志出版社,2017年)对全市2099种维管束植物,改变传统以生活型分类的记述方法,仅以50余字对其按生活型分类情况和按来源分类情况略作交待,继而按用途分类记述,将之分为食用植物、药用植物、工业用植物、防护与改造用植物及植物种质资源5大类,每大类又细分小类。如食用植物按用途细分为野果类、野菜类、调味类、饮料类、酿酒类5小类;工业植物按用途细分为生物能源植物、纤维植物、芳香油植物、鞣料植物、树脂植物、工业油脂植物、色素植物、用材树种8小类。《龙湾区志》(中华书局,2013年)则在自然资源章下特设药用植物一节,以列表形式对区境内大罗山103种主要药用植物进行详细记述,介绍每种药用植物的名称、科名、地方名、拉丁学名、形态、生长环境以及主治病症等,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在记述地质、矿产时,《温州市志(1991—2012)》除了简略记述地层、构造、岩浆岩等与前志相关内容外,根据温州市区地处瓯江口的实际地情,以及近年来城市化发展加速、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力度加大等现实发展新情况新变化,增设“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海岸带稳定性”3个目,分别记述4类岩体工程地质的分布、构成和特点,自上而下逐层介绍22层土体工程地质层的物质成分、深度、层厚和特性;客观记述地下水开采量增长、地下淡水资源衰减、浅层地下水污染、围填海工程地面沉降、瓯江口浅滩淤积等问题,对潜在的未来风险作了预警。武义县素有“萤石之乡”之称,萤石资源丰富,县内原有东风萤石公司等创汇大户。首轮修志成果《武义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将“萤石资源”归入“经济编”中的“萤石矿业”章中记述,“地理编”中“自然资源”章中仅在“矿产”节下设目,记述不足百字。第二轮修志成果《武义县志(1996—2005)》(方志出版社,2010年),根据时限内县域萤石矿总储量锐减、当地产业结构调整,萤石从工业原料转型为高附加值的萤石文化产品的现实,取消“萤石矿业”章,将“萤石资源”重新纳入自然部类“土地与矿产”编中设节记述。同时,根据该县大力发展温泉产业的实际需要,特设“地热与矿泉”节,增加相应内容记述,以适应该县建设“温泉名城、养生武义”发展战略转型需要。

在记述气候内容时,《余杭通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特设“气候与农业”一节,下设“气候与粮食作物”“气候与经济作物”“气候与果树”“气候与蔬菜”等6个一级目,分别详细记述气候对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果树、蔬菜、淡水鱼、畜禽等的具体影响情况。《龙湾区志》《瓯海区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等也都设专节记述物候特别是农事物候的内容,详细记述一年中山桃始花、垂柳发芽、樱桃始花、梨始花、蛙始鸣等各种物候现象出现的平均日期、最早日期、最晚日期、多年变幅,以及相对应的平整秧田、早稻浸种催芽等主要农事情况。这些记述对农业生产的针对性、指导性都很强。

随着城市居民健康养生理念的勃兴,地处浙南山区的文成县逐渐成为各种药膳重要原材料的来源地。该县在第二轮修志成果《文成县志(1991—2011)》(方志出版社,2019年)“植物资源”节中,专设野生蔬菜资源目重点记述,以17页的篇幅列表详细记述该县170余种野生蔬菜的名称、食法、功效及其在县域的分布情况,并对其中分布广、食用普遍、功效好的主要野生蔬菜以附图形式予以重点记述,具有非常强的社会实用性。

二 立足破除要素化痼疾，重视并加强对自然地理实体尤其是自然景观的记述

社会主义时期新编地方志书通过贯彻横分门类、纵述史实的编纂原则，按照形式逻辑的要求抽丝剥茧式地层层细分、步步深入，确保了所要记述事物各个构成要素的全覆盖，从形式上充分地体现了志书编纂的严谨性和科学性。随着修志实践活动的持续开展，这一做法却被发挥到了极致，层次越分越多，从编（卷）到章、节、目、子目，子目之下还得往下继续分。这样做的结果，使志书内容出现了类似于把一台机器拆解开来，将螺帽归一堆、螺钉又另归一堆的情形。具体到自然部类，相关内容记述就细化落实到各个要素，形成了要素化记述方式，从而使志书内容出现了严重的碎化问题。一部志书就像是堆放着由不同材质、不同粗细绳索串起的机器零件的库房。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检索（寻找零件）很方便。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要去库房领一台缝纫机或电风扇这样的机器是没有的，只能领了各种零件自己组装。也就是说，人们很多时候从中看到的只是一个个“零件”，而看不到整架“机器”的整体样貌。一般而言，绝大多数人希望看到的是组装成型的“机器”，对分门别类成堆成串的“零件”是不感兴趣的。

就地方志书自然部类所记述各要素的联聚情形而言，各种自然地理实体特别是自然景观，是最为直观的。“景观”一词，原是个美学概念。19世纪中叶，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洪堡（A. Von. Humboldt）将“景观”一词引入地理学科，用它来描述和代表地球表面一个特定区域的总体特征。地理学概念中的景观，被认为是由气候、水、土壤、植被等自然要素以及文化现象组成的地理综合体。它反映了地理学研究中整体上把握地理实体综合特征的客观要求。后来，德国地理学家C. 特洛尔又将景观概念引入生态学，创立了生态学新分支——景观生态学。景观生态学概念中的景观，则是由相互作用的拼块或生态系统组成、以相似的形式重复出现的一个空间异质性区域，是具有分类含义的自然综合体。不管是哪个学科概念中的景观，其所指的客体是一致的，区别仅在于研究者的主观目的不同，就像对面站着一个人，艺术家看见了美丑，道德家看见了善恶，人类学家看见了体质一样。地方志书由于自身的百科全书式特点以及预设阅读对象的广泛性，在自然部类中对景观进行选择记述时，应尽可能充分了解并回应各学科的关切。做到这一点，地方志的存在与发展才有了坚实的基石。

在中国古代地方志书中，多有以“四景”“八景”“十景”之目对当地景观进行记述的传统。当然，由于不少志书编纂者囿于自身识见和私心，对于景观的选取失之精审，又将自己或亲友一些鄙陋粗劣诗文充斥其间，加之乾嘉以降学者的学术旨趣和偏好，使得志书中“×景”之类的内容倍受挞伐，往往被斥为无用之文。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近年来关于这些内容的价值日益得到认识和重视，有学者还详细分析指出其所具有的8个方面史料价值。^①在浙江省近年来大规模开展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活动中，这些以“×景”名目在历代地方志书中保存下来的历史景观，成了难得的珍贵图像资料。它们的发掘利用，激发了村民的家乡自豪感，厚植了村民的乡愁乡思乡情，在把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成为村民的精神家园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有鉴于此，浙江省在第二轮市县修志实践中，对于如何继承和弘扬前人好做法好经验的课题

^① 参见张廷银：《地方志中“八景”的文化意义及史料价值》，《文献》2003年第4期；王德庆：《论传统地方志中“八景”资料的史料价值：以山西地方志为例》，《中国地方志》2007年第10期。

进行了客观思考、认真研究,在新修市、县(市、区)志的编修实践中,进行了积极引导和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果。它们突破了首轮志书记述偏重单一事物近距聚焦细部呈现形式,有意识地将需要反映的事物置于整个景观中予以整体呈现,既增强视觉审美效果,又丰富信息含量,提升了历史价值。《杭州市滨江区志》(方志出版社,2020年)是浙江第二轮修志涌现出的一部独具特质的志书。该志除志首概述首冠《滨江赋》外,于每编下亦精心撰有赋文一篇,其自然环境编下赋文:“滨江境域,锁钥古都。生态自然,山水天铸。丘陵低附,平原为主。北是沙地,南为黏土。狮象南峙,钱江北渡。美女传芳,城山拒吴。鸡鸣待诏,井山含珠。……涂藏獭兔,滩翔鸥鹭。马湖鲤美,钱塘鲈腴。钟灵山水,毓秀田庐。美哉滨江,锦丽画图。”^①令人不由拊掌称妙。《舟山市志(1989—2005)》(商务印书馆,2016年)载录金塘大桥、桃夭门大桥、岑港大桥等跨海大桥,将大桥与近处的岛上民居、稻田、绿植,和远处的大海及斜拉索桥塔、驶过的船舶等融绘于一景;其他如嵎山岛、休渔开捕、东极海钓、朱家尖五沙连环,也都展现了独特而浓郁的海岛自然景观。《青田县志(1988—2007)》(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主编陈慕榕也是首轮新编志书《青田县志》主编,执掌第二轮修志时已年近八旬,但思想开放、创新意识很强,为避免自然部类“炒冷饭”的尴尬和无谓,他进行了积极创新,在志中首冠“概貌”,其下以“山河大观”统领地貌、瓯江、气候、土地、环境,以极为简明扼要的记述文字配以通栏的典型景观图照,“地貌”中选配“章旦(乡)晨曦”“雾绕阜山”“东源村陈吾洋河谷平地”3种地貌景观;“环境”中选配青田县城区河道清晨白鹭群集飞翔的景观图和乡村牛鹭和谐相处的景观图,完美诠释了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文成县志(1991—2011)》(方志出版社,2019年),在彩版中将县域九镇一乡的集镇聚落景观以全景图的形式逐一精选入志,不仅展示了文成县作为浙南山区县各种类型集镇的聚落风貌,还选取了一幅由蜿蜒盘旋的通村公路、山巅错落有致的村庄聚落、层叠的梯田,以及望不到尽头的丛山构成的山村景观图。展示了浙江省实施乡村康庄工程,实现全省农村公路“村村通”的伟大成就,彰显了党和政府的为民情怀和使命担当。

三 着眼为资政辅治服务,重视运用区域理念摒弃泛化 记述反映区域化差异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古人很早就深刻地认识到了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的深刻影响。宋代人庄绰指出:“大抵人性类其土风。西北多山,故其人重厚朴鲁。荆扬多水,其人亦明慧文巧,而患在轻浅。肝鬲可见于眉睫间。”^②近人蒋百里也曾说:“近于山者,其人质而强;近于水者,其人文以弱。地理之移人盖如是,其甚也!”^③而明代学者王士性还按不同区域的地理环境特点将浙江的人民分为“泽国之民”“山谷之民”“海滨之民”,谓:“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所聚,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鸷馐,轻犯刑法,喜习俭素,然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傲缙绅;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闾阎与缙

① 杭州市滨江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杭州市滨江区志》,方志出版社,2020年,上册,第97页。

② 庄绰:《鸡肋编》卷上《浙西谚语与民性》,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第11页。

③ 参见《浙江潮》发刊词,《浙江潮》1903年第1期。

绅相安，官民得贵贱之中，俗尚居奢俭之半。”^① 凡此种种，均揭示了自然地理环境在一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所具有的基础性作用。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将自然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一道，并列为地方志书的五大内容，且居于其他四大部类之首，其深意或就在于此。

地理学家王成组在《地理学之区域观念》一文中指出，“地面上的各种景象，在观察的时候，固然可以个别提出，实际上他们是一种复杂的集体现象。因此，地理学于分别观察各种景象之外，必须表白这些景象在每一处地方的联聚情形。景象的联聚，在任何地方，都有他的一种格式。凡是气候所直接，或则间接（由于各种生物的生机）表现的四时气象，山丘、原野、岩石、土壤、河流、湖海、滩岸、崖谷等自然景成分所表现的地面本相，以及由田地、园林、道路、桥梁、车辆、房屋居民、牲畜等文化景所表现的各种建设，每一个成分都可以有许多变化，所以联聚的格式可以有许多差异。”^② 多山的地方与原野不同，高爽的地方与低湿的地方不同。同是山地，或者可以垦地，或者可以开矿，或者富有林泉，或者仅能放牧。于是，人口的稀密，聚落的大小，以及交通、防护等情形，也都不免大相迥异。而地方志书在注重对自然地理环境各要素（成份）进行专注记述的同时，不仅忽视了对各种自然地理景观的记述，而且更忽视了这些要素（成份）以及景观在地球不同表面联聚格式或情形的差异。

事实上，早在大禹时期人们已经注意到区域之间的差异，并开始运用区域化理念来实施分区管治。《尚书·禹贡》载：“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③ 到了东汉时期，“区域”一词正式在文献中出现。东汉郑玄为《周礼·地官》中“廛人”作注说：“廛，民居区域之称。”^④ 此后，“区域”一词使用日多，晋潘安仁《为贾谧作赠陆机》诗云：“芒芒九有，区域以分。”^⑤ 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卷三谓：“咨其风土，考其区域。”^⑥ 一般而言，区域指的是地球表层的一个片段，具有一定的面积、形状、范围或界线，内部的特定性质或功能相对一致而有别于外部毗邻地区。当代地理学家罗伯特·迪金森（Dickinson, R. E.）曾提出，“近代地理学所有杰出的创建者……所一贯关切的目标是区域概念，即地球表面各个特定和一般地段内各种地理现象的结合方式”^⑦。区域在分类上具有多样性特点，按区域性质分，有自然（地理）区域、经济区域、行政区域、文化区域等；按区域内部的分布状况分，有同质区域、结节区域等。同时，在区域内部还具有多层次性特征，一个大的区域内部可以划分不同等级的亚区域（或子区域），区域等级越高，区域内部就越复杂，同一性就越小；反之，区域等级越低，区域本身就越简单，区域内部同一性就越大，差异性就越小。

地方志书作为全面系统记述一个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无论古代还是当代在编纂过程中对于编纂对象在行政管理上的区域意识是天然重视的。但是，行政区域的划分是基于多重考量的，在遵循“山川形便”自然区域划分原则的同时，更多时候还要考虑政治制衡而在行政区划实施上采取“犬牙相错”办法。因此，多数行政区域内部十分复杂，地方志书在记述时采取划分亚区域就很有必要。它不仅能使读者准确了解

① 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本，第68页。

② 王成组：《地理学之区域观念》，《新史地》1937年第1期。

③ 《尚书》卷上，《夏书·禹贡》，明内府刻本，第28页。

④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9，第3册，第11页。

⑤ 萧统：《文选》卷24，《赠答类》，明末毛氏汲古阁刻本，第8册，第14页。

⑥ 陈康祺：《郎潜纪闻》卷3，光绪十年（1884）琴州刻本，第1册，第15页。

⑦ [英] 罗伯特·迪金森著，葛以德译：《近代地理学创建人》，自序，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页。

和掌握一地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基本情况，而且也有助于志书资治功能的发挥，使党委、政府可以根据各个不同亚区域实际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开发、建设和管治工作。比如，《绍兴市志（1979—2010）》（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在记述市域范围的植被时，除了散处分布的水生植被外，将其划分为低山丘陵森林植被区、水网河谷平原人工栽培植被区、滨海平原人工栽培及盐生植被区三大区域进行记述。《宁海县志（1987—2008）》（方志出版社，2019年）在记述县域植被时，除水上覆被外，也有意识地将之划分为针叶林和竹林区、针阔叶混交林区、经济林区、天然植被区四大区域来加以记述；同时，在记述农业生产自然条件时，还将县域划分为西部生态农业区、中北部近郊型农业区、东南部沿海现代农业区三大亚区域，分别介绍各自空间区域范围、种植制度、资源开发利用优势及发展潜力。《温州市志（1991—2012）》在记述地貌时，将市域划分为西部山区、中部低山丘陵盆地区、东部平原滩涂区以及岛屿区四大亚区域。《杭州市滨江区志》同样有意识地将滨江区境域内不同亚区域之间差异作了客观揭示，“丘陵低附，平原为主。北是沙地，南为黏土”，“北地棉麻，南畝稻菽。东坞茶菇，西坡松竹”。同时在政区编介绍区辖西兴街道、长河街道、浦沿街道三大街道时特设区域特色一目，分别介绍各个街道的区域特色，如西兴街道历史上曾是沟通钱塘江与浙东运河两大航道交汇点西陵渡所在，素为商旅繁盛之地，区志以“传统产业发达”“商贸业繁盛”“运河文化丰厚”为其区域特色；长河街道地处滨江区中部，长河老街为浙江历史文化街区，街道辖区南有白马湖生态创意城、北有滨江互联网现代科技新城，区志以“传统产业发达”“兴学重教传统”“历史建筑毗连”“南北双城崛起”为其区域特色。地方志编纂者尤其是续志自然部类编纂者，不应该简单沦为一名“仓库零件码包员”，而应该成为一名站在区域发展前沿的地情信息分析师，揭示一个行政区域范围内不同亚区域的自然禀赋差异，为各级党委、政府部门制订区域发展战略提供精准、实用、有效的信息。

四 扛起史家责任担当使命，转换视角别开生面精准记述自然环境之变

地方志书自然部类不少内容属于长时段事物，发展变化十分缓慢。一座山脉形成以后，其位置、高度、范围等指标在长达数百万年乃至数亿年间不会有太大变化。然而，山川固然千古不易，但其具体面相却可以四时不同、随势而异。塔里木盆地的罗布泊曾经是我国第二大内陆湖，多河汇集，水清草美，周边灯火万家，楼兰城立。然而因为人为破坏及自然原因，到20世纪70年代开始干涸，现在仅留盐壳，寸草不生，荒无人烟。1959年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罗布泊小组在湖心岛上拍了一张照片，清晰显示小岛高出水面1—2米，三面环水，湖岸已经结出灰白的盐壳，这是人类最后拍摄到的荡舟罗布泊画面，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再比如，绍兴历史上闻名遐迩的鉴湖，自东汉会稽郡太守马臻拦截城南会稽山三十六源之水筑堤成湖，据东晋孔灵符《会稽记》载，“堤塘周围三百一十里，溉田九千顷”，稍晚的北魏酈道元《水经注》说“湖广五里，东西百三十里”。当时鉴湖面积约相当于现今杭州西湖面积的30倍，因系沿会稽山麓地带筑堤截流成湖，东西横亘而长，故又有“长湖”之称。东晋会稽郡太守王羲之曾有“山阴路上行，如在镜中游”的由衷赞叹；其后顾野王在所撰《輿地志》中同样也说，“山阴南湖，萦带郊郭，白水翠岩，互相映发，若镜若图”，故鉴湖又盛享“镜湖”美名。^①到了南宋，围湖造田加剧，湖区变成了农田，鉴湖逐渐毁废消亡，仅剩下一簇簇“斑块”般的湖塘水

^① 参见施宿等撰：嘉泰《会稽志》卷10，“镜湖”条，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第7册，第19—20页。

系群落。晋人眼中“如在镜中游”的壮丽景观和让唐代诗人回味无穷的鲈鱼^①，也都淡出了文人骚客的视野。到南宋末年时，庄绰在《鸡肋编》中已说：“越州在鉴湖之中，绕以秦望等山，而鱼薪艰得，故谚云：有山无木，有水无鱼，有人无义。里人颇以为讳，言及‘无鱼’，则怒而欲争矣。”^②对于鉴湖及其景观的历史变迁，时人因受理念和识见所限并未给予足够关注，后人只能从诗文中发微阐幽得窥一二。因此，地方志书自然部类记述要采用远近结合、立体记述的方式，注意发现并记述自然环境的变迁过程和情况。

在浙江第二轮修志实践中，不少志书编纂者就如何更好地忠实记录自然环境的历史变迁课题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杭州市滨江区地处今钱塘江南岸。秦汉以前钱塘江河口段水面辽阔浩瀚，今滨江区境域皆在海中。唐宋以后江道北移，南岸沙涂淤积成陆。又历代官民筑塘围垦，遂渐成桑麻宜居之区。《杭州市滨江区志》设专节记述江道变迁，以翔实的文字资料准确反映了钱塘江江水先后走南大门、中小门和北大门的历史变迁过程，同时辅以《宋时钱塘江江道示意图》《清初钱塘江江道示意图》《清嘉庆间钱塘江江道示意图》3幅不同历史时期的钱塘江江道位置示意图，真实地还原了滨江区境随着钱塘江江道变迁而沧海桑田的自然环境变迁史。同时，该志还十分有心于历史变迁资料的搜集，搜集了西兴街道西兴官河改造前后的沿河景观图照，浦沿街道20世纪70年代集镇泥鳅街、90年代集镇中心和2015年新建现代化居民小区，以及滨江区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农居图照。

嘉兴市海盐县东濒杭州湾，南临钱塘江，与对岸余姚市、慈溪市、绍兴市上虞区隔水相望。由于受地貌、洋流、风向等影响，钱塘江潮流摆移不定，处于杭州湾两岸南涨北坍总格局下的北岸海盐县境域，历史上在海岸线不断内缩的总趋势下，不同区域也存在着有坍有涨、时坍时涨的情况。第二轮志书记述时限内，海盐县域开展了大规模的标准海塘建设。《海盐县志（1986—2005）》（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特设“杭州湾与钱塘江”专编，记述海盐县境域时限内杭州湾海岸线变化、洪涝灾害、标准海塘建设、滩涂围垦等情况，真实记录了海盐县陆地海岸线因筑堤围涂、修筑标准海塘等，从首轮志书记述下限1985年末53.48公里到第二轮志书记述下限2005年末51.69公里，减少了1.79公里的史实。志书还在该编“洪涝”节随文插配了一幅反映1997年7月2日强降雨后濒临杭州湾的县城武原镇遭水淹情景的图照。图照定格了1999年在县城宽阔的百尺路上以船为车的历史真实情形。

《象山县志》（方志出版社，2019年）通过在自然部类中增设“乡村聚落”篇，对全县477个行政村、1010个自然村开展大规模采访调查，形成长达65页的《象山县村落姓氏情况表》，详细记录各个村落始迁姓氏、迁自何处、何时迁入等，基本摸清了全县各个乡村聚落的形成史。《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2017年）也特设“聚落”专卷，对全县包括县城各街道和乡镇各自然村落都具体记述，包括名称、得名由来、户口情况、始迁姓氏、主要姓氏、始迁何处、聚落历史隶属变化等。对于乡村已消失的村庄聚落，也一并予以记述反映；对于城市化进程中新建成的城市小区，则注明了历史上的聚落情况。另外，该志还从旧宗（族）谱中搜集选录了毛村、后周等村的历史聚落图。全志用66页的篇幅全面系统反映龙游县聚落发展变迁的历史情况。《青田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根据县域内因滩坑水电站水库下闸蓄水淹没村庄以及因下

① 参见羊士谔：《忆江南旧游二首》之一：“山阴道上桂花初，王谢风流满晋书。曾作江南步从事，秋来还忆忆鲈鱼。”

② 庄绰：《鸡肋编》卷上《越州谚语》，第10页。

山异地脱贫中自然村整体搬迁后原村落复垦为田或退房还林的实际情况，设立“村落留影”专章，以图文结合的形式形象具体地记述该县原北山村、白岩村、叶段村、妙后村、张口村、桔圩村等26个行政村在水库淹没前的村貌和基本情况，以及巨浦乡坑下村茶圩自然村、舒桥乡丁埠头村坦坑自然村等9个整体搬迁下山异地脱贫村搬迁拆迁前后的村貌。此外，还随文收录了一幅拍摄于2005年的搬迁下山村底垟村1912年黄山山体坍塌遗迹的图照。《嘉兴市志（1991—2010）》（商务印书馆，2020年）也以分类逐条设目对嘉兴市新建街路、拓宽延伸的街巷、消失的街巷，以及消失的桥梁、河流、村落、社区、居民点等进行详细而具体的记述。笔者因为早年从事乡村社会史研究，比较关注乡村聚落变迁调查与研究的价值，与志界同仁交流时常常鼓励倡导开展此项调查，浙江省第二轮修志中在这方面涌现了不少取得突破性的地方志成果，但以系统性、全面性而论，则非《象山县志》《龙游县志》二志莫属。

《象山县志》还在海洋环境篇中设立海岸线专章，记述象山县境内自然岸线和人工岸线的分布，以及1990—2008年间檀头山、南田岛、高塘岛、花岙岛等处岸线长度变化，设立专节记述各历史时期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围垦筑塘而发生岸线具体变迁情况。同时该志还采用课题项目形式组织开展了县境内物候资料的跟踪记录、日出日落时间的观测记录，以及根据2008年进行的全县无居民岛屿调查，对从原608个岛礁基础上分离增加的76个岛礁和因围入海塘或与大岛相连作注销处理的28个岛礁都作了详细记载，客观反映了县境内岛礁的历史变迁情况。《温州市志（1991—2012）》则记述了围填海工程活动引起的海岸带地面沉降和瓯江口浅滩淤积等特定环境地质变化，其中根据监测资料记述：瓯江口岛内展览馆建筑物最大累计沉降约1米，平均沉降速率约16.67厘米/年；浅滩一期南围堤施工完工后，堤坝5年累计沉降为0.29—0.81米，平均沉降速率为11厘米/年。凡此种种，都通过转换角度，聚焦新变，错位记述，保存了珍贵的历史资料，也为当地党委政府现实决策提供了坚实依据。

结 语

创新是永恒的主题，也是地方志事业不断破解困境、永葆旺盛历史生命力的关键。自然部类记述创新，应始终牢固树立并坚持“内容为王”“读者至上”理念，保持对历史发展大势的宏观把握和对微观事物发展变迁的敏感敏锐，根据时代发展与社会需求的变化，与时俱进地适时调整篇目框架和增强对社会现实需求的关怀关照，使形式更好地为内容服务，使内容更好地为现实服务。

（作者单位：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

本文责编：周 全